“残缺”作为方法：美国文学中的残障身体、凝视机制与“感知共同体”

王婧伊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8）

摘 要：本文以“假肢”（prosthesis）为核心枢纽概念，以《白鲸》《好人难寻》《心是孤独的猎手》《亲缘》为核心文本，以《怪胎之爱》《我的生活故事》为对照文本，梳理美国文坛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残障身体的书写机制，提出“残缺如何组织看与被看、并生成共同体”这一问题，以区别于既有研究对残障形象的再现式归纳。并沿“假肢—目光—感知共同体”三条线索递进论证，假肢如何作为物质与叙事的双重装置，为以共享、部分、相互依存的感知经验为纽带的“感知共同体”，提供了一种区别于国族想象与身份认同的联结模型。进一步阐释美国文学中的残障身体书写并非对“缺失”的哀悼，而是关于“部分性”（partiality）的伦理构想，即残缺不是有待修复的缺陷，而是重塑共同体想象的结构性起点。

关键词：残障研究；假肢；凝视；感知共同体；美国文学

DOI：https://doi.org/10.65196/c33g8b86

一、引言：从“残缺”到“感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残障研究（disability studies）在欧美人文社科领域完成了从“医疗模式”（medical model）向“社会模式”（social model）的范式转移。残障不再被理解为个体身体的医学缺陷，而被视为由社会制度、文化表征与话语实践共同建构的差异范畴。伦纳德·戴维斯（Lennard J. Davis）在《强制正常》（*Enforcing Normalcy*）中揭示，“正常”（normalcy）并非自然事实，而是伴随统计学、优生学与工业化兴起的历史建构，其功能在于以“健全”（able-bodiedness）为坐标，把差异放逐为异常。[1]这一洞见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有力的解构工具，将残疾的身体交由医学解释，虽然考虑到了身体损伤，但忽视了社会环境突出残疾人和非残疾人之间的差异[2]，因此文学中的残障身体由此不再是“医学个案”的摹写，而是文化意义的生产现场。

既有研究大多止步于归纳残障人物是“恶魔化”还是“英雄化”，却很少追问叙事形式本身如何在读者身上生产出对残缺的感知。换言之，残疾作为人类身体的非典型表征方式，具身地体现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所承载的焦虑、问题和需求”[3]，尚未充分转化为一种“形式—感知诗学”。选择 19—20 世纪美国文学作为考察场域，这段时间恰好呈现出残缺被“处理”的几种典型方式。19 世纪的海洋史诗把残缺升华为形而上的对抗；20 世纪中期的南方短篇与南方小说把残缺置入社群与凝视的日常网络；晚近的思辨小说则把残缺交还给被压迫者的历史记忆。三者的时间跨度，使“残缺如何被组织为意义”这一问题的历史层次得以显现。

作者简介：王婧伊(200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 DAVIS L J. Enforcing normalcy: disability, deafness, and the body[M]. London: Verso, 1995.

[2] 赵森, 易红郡. 从个人到社会：残疾模式的理念更新与范式转换[J]. 残疾人研究, 2021(3):12-22.

[3] 张申华, 李保杰. 《极客之爱》中的残疾身体与科技伦理[J]. 当代外国文学, 2024(1):52-58.

表 1-1 核心概念的三重界定

关键词	概念内涵	主要学者	主要观点
假肢	义肢实物（prosthetic device）“叙事假肢”（narrative prosthesis）；“技术具身”（technological embodiment）	Mitchell & Snyder；Ihde；Merleau-Ponty	把抽象的“残缺”物质化、可视化，使创伤获得可见的形式
目光	他人的凝视、制度的注视与残障者自身的感知构成的关系场	Garland-Thomson；Sartre；Foucault	分配“看与被看”的位置，是主客关系发生反转的场所
感知共同体	以共享的、部分的、相互依存的感知经验为纽带的临时聚合	Merleau-Ponty；Williams	提供非同一性、异质、临时的共同体模型，为本文的理论贡献点

二、假肢：物的介入与“叙事假肢”

假肢之所以适合充当枢纽，在于它同时是物与意指。它既是一件可以被触摸、被测量、被窃取的东西，又是一种把“缺失”转换为“在场”的机制。本节将从三个文本切入，考察假肢如何在叙事中完成“物的介入”。

（一）鲸骨与象牙：亚哈的物性与“伤口的收集”

《白鲸》中的亚哈是残障身体书写的原点。他的假腿由鲸骨与象牙制成[4]，这一材质选择本身已蕴含悖论，即夺去他一条腿的鲸，同时又以自身的骨与牙为他提供了新的支撑物。身体与它所对抗的世界由此在物的层面相互缠绕，残肢不是与世界断裂的证明，反而成为与世界重新连接的接口。值得注意的是麦尔维尔如何书写假腿的使用感。当亚哈在甲板上直立、当他在舱室里以特制的孔洞固定那条腿以抵御风浪时，这条腿并非“被动的替代品”，而是参与他行动的技术性身体。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曾以盲人的手杖为例指出，当工具被熟练使用，它就不再是“被感知的对象”，而“退入”（recede）到身体的图式之中，成为知觉的延伸。[5]亚哈的假腿正处在这一由“物”向“身体”过渡的临界点上，它既是他每次踏步都被提醒的创伤对象，又是他支配甲板的行动器官。

进一步看，假腿赋予亚哈的不仅是一种行动力，更是一种垂直的权威。在《白鲸》的船上空间中，“站立”意味着指挥，而假腿恰恰使这位失去一腿的船长得以重新“直立”于甲板之上，并以之宣示他对船员与航程的支配。麦尔维尔特意描写木匠为他制作新腿、描写他在风浪中用索具把自己固定在腿上的场景，这些细节都把假腿呈现为一种权力得以运转的必要装置。[6]于是，身体的残缺非但没有削弱权威，反而通过物的中介被转化为权威本身的一部分，这构成了对“残缺即无能”这一健全主义（ableism）预设的文学反驳。不过，这种转化也付出了代价，亚哈愈是依赖假腿，便愈是被自己所仇恨的东西所支撑，他与白鲸的关系由此陷入一种无法挣脱的相互缠缚。由此，假肢的第一重功能得以确立。它把不可见的残缺转化为可见、可触的物，从而使创伤获得了形式。

（二）木腿之辩：奥康纳与“物的所有权”

如果说亚哈的假腿是权力的延伸，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好人难寻》中赫尔加（Hulga）的木腿则是一场关于意义所有权的争夺。赫尔加原名乔伊（Joy），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笃信虚无主义，自命为智识上的看穿者。她的木腿在文本中被赋予特殊地位，她“像

[4] MELVILLE H. Moby-Dick; or, the whale[M].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3: 第 106 章 “Ahab's Leg”；“ivory leg”见第 28 章.

[5] （法国）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 MELVILLE H. Moby-Dick; or, the whale[M].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3: 第 107 章.

对待自己的灵魂一样”[7]看待它，拒绝他人以怜悯的目光触碰它。这里出现了一个微妙的颠倒，通常被视为羞耻之源的假肢，被主人改造为自我尊严的最后堡垒。赫尔加的虚无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种为抵御他者凝视而构建的防御工事，既然一切都无意义，他人的目光也就无从伤害。

更值得细究的是眼镜的符号功能。木腿支撑“行走”，眼镜支撑“观看”，而赫尔加以哲学家的姿态自居，其自我认同恰恰建立在“看得比他人更清楚”这一前提之上。曼利同时取走这两件器物，等于同时拆毁了她与世界发生关系的两条通道——她既无法行走，也无法看清。此后叙事语气的陡转，从智识的傲慢跌入彻底的羞辱，而这正源于这种双重器具的丧失。奥康纳的刻薄正在于此。赫尔加自以为占据了“看透者”的主体位置，却恰恰在最私密处被物化为一个可以拆卸的客体。米切尔与斯奈德所言“残疾作为叙事装置、终将被清除”的逻辑在此被反讽地演出——被“清除”的不是残疾本身，而是残障者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假肢由此显现出第二重功能，它既是自我的屏障，也是自我最脆弱的暴露点；谁拥有假肢，谁就拥有意义的定义权。[8]

（三）幻肢与时间：从《亲缘》看身体的历史铭刻

奥克塔维亚·巴特勒的《亲缘》把假肢问题推向时间维度。小说中，黑人女性达娜（Dana）反复被卷入19世纪的南方种植园，每一次穿越都以她身体的受损为代价，最终在回到1976年后发现自己失去了一条左臂——它在时空的边界处被墙所“吃掉”。[9]这里的“假肢”具有双重性。其一是时间旅行本身作为义肢，穿越使达娜得以把断裂的族裔历史缝合进自身的当下经验，时空装置充当了连接两个时代的技术性“义肢”；其二是幻肢（phantom limb），失去的手臂在感知中并不真正消失，它以幽灵般的在场提醒着被割断的历史。[10]萨米·沙尔克以“身心”（bodymind）概念分析此类文本，指出种族暴力常常通过身体的残缺被感知和记忆。达娜的断臂于是不只是一个身体的损失，而是一段被铭刻进身体的历史，即奴隶制对黑人身心的剥夺，被压缩为单个人的一条手臂。[11]更重要的是，巴特勒把“亲属关系”（kinship）本身假肢化了。达娜与19世纪的祖先鲁弗斯（Rufus）之间，形成了一种被时间撕裂却又无法切断的依附关系。她既憎恨他，又必须保护这个使自己得以存在的祖先。在这里，血缘最古老的“义肢”显现出其悖论，它既是让自我得以延续的支撑，又是让自我承受历史创痛的通道。

假肢的第三重功能由此浮现，它使时间中的断裂获得身体形态，使“过去”成为一种可以被感知的残缺。值得补充的是，达娜的断臂还向读者提出了一个关于“阅读位置”的问题。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读者被迫与达娜共享其身体被逐步剥夺的过程；当她在尾声平静地写下“我在最后一次回家时失去了一条手臂”时，读者所经验到的不是旁观的怜悯，而是一种切身的部分性——我们被邀请承认，自己所属的身体同样是脆弱的、可能被剥夺的。这一阅读效果正是“假肢”作为叙事装置的深层功能，它不仅标记人物的残缺，也把残缺的可感性传递给读者自身。

三、目光：凝视机制与主客反转

如果说假肢是“物”的层面，残缺在那里被物质化、被技术中介、被叙事固定为一处可见的标记，那么目光则是“关系”的层面。残缺在此不再是身体上的某个位置，而成为一种组织观看的结构性力量，决定谁有资格看、谁被迫被看，以及这一看与被看的关系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划分出主体与客体，二者并非简单并列，而构成由物到关系的递进。

（一）杜布隆金币：多重观看与凝视的分散

《白鲸》第99章“杜布隆”（The Doubloon）是理解麦尔维尔观看政治的关键章节。亚哈把一枚金币钉上主桅，悬赏给第一个发现白鲸的人，随后各色人物逐一上前观看这枚刻有十二星座图案的金币，各自读出截然不同的意义。亚哈在其中看到自己的命运，斯达巴克（Starbuck）读

---

[7] O'CONNOR F. Good country people[M]//O'CONNOR F.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55.

[8] 张小凤. 弗兰纳里·奥康纳作品中的疾病叙事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20.

[9] BUTLER O E. Kindred[M]. Boston: Beacon Press, 2003.

[10] 关于幻肢与身体图式的关系，参见 MERLEAU-PONTY M.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M]. LANDES D A, trans. London: Routledge, 2012.

[11] 梁文. 奥克塔维亚·巴特勒《亲缘》中的种族与性别歧视[D].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17.

出宗教的警示，斯塔布（Stubb）视之为一个玩笑，弗拉斯克（Flask）只看到“一个圆东西”，那位来自马恩岛的老水手则把它读作人生如梦的象征。[12]这一段落的意义不在于“谁读得对”，而在于它示范了一种凝视的分散。同一件物被多重目光切割，产生彼此不可通约的意义。观看在此不再是单向的、规训性的“主体的独白”，而成为一场多声部的意义争夺。这对残障研究具有启示意义，即如果把残障身体视为一枚被钉上桅杆的“金币”，那么围绕它的目光从来不是单一的，医学之眼、道德之眼、审美的奇观之眼同时在运作。麦尔维尔以文学的方式，提前演示了加兰-汤姆森所说的“凝视的多元性”。[13]

（二）医学与奇观：凝视的两种制度

残障身体所承受的凝视，主要来自两种制度化的目光。其一是医学。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描述了“医学凝视”（le regard médical）如何把病人身体转变为可被分类、可被书写、可被规训的对象。身体在此成为“病例”，其差异被翻译为“症状”，[14]这是一种使残缺病理化的目光，它不承认身体自身的合法性，只承认“正常”的规范。凯瑟琳·邓恩（Katherine Dunn）的《怪胎之爱》（Geek Love）把这一逻辑推到极致，宾诺夫斯基一家刻意通过化学与放射手段生育畸形儿，以组建马戏团的“怪胎秀”（freak show）。畸形在此既是医学凝视的产物，又是它被商品化的景观。

其二是奇观。加兰-汤姆森指出，凝视（staring）把残障身体置于“奇观”的位置，使之成为供公众消费的视觉事件。[15]《怪胎之爱》中的“怪胎秀”正是制度化奇观的缩影：观众付费参与一场被组织起来的观看仪式，以确认自身的“正常”。而小说的叙述者奥林（Olympia，一位白化病的驼背小矮人）以第一人称讲述这段历史，则构成一种来自景观内部的注视，即被观看者开始讲述，奇观的边框随之松动。值得注意的是，奥康纳笔下的赫尔加同样处在奇观与医学的双重目光之下。她的木腿既是乡村社群偷窥的对象，又是她哲学头脑试图超越的“肉体事实”。而当曼利夺走木腿，赫尔加便被还原为一个纯粹被看、被处置的奇观客体，这正是凝视的最暴力形态。

（三）凝视的性别政治：木腿、畸形与女性的双重客体化

残障身体的凝视从来不是性别中立的。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指出，在主流视觉文化中，女性性感的身体是被动的欲望对象，它可以像纯粹的物一样组装起来，而男性则在凝视中扮演着活力赋予者的角色。[16]当“女性”与“残障”两种身份叠加，凝视便呈现出双重客体化的效应——残障女性既因性别而被观看，又因身体的差异而被加倍地奇观化。奥康纳笔下的赫尔加正处在这一交叉点上。她既是被母亲怜悯的、未婚的“老姑娘”，又是身体残缺的哲学博士；她的知识非但未能使她免于被看，反而使她成为更值得被“拆穿”的对象。

曼利之所以能夺走木腿，正因为他同时利用了性别与残障两重弱点：赫尔加渴望被爱（性别规训），又渴望被承认为“正常”（健全主义规训）。她的失败因而不是个人的失败，而是两套规训机制合谋的结果。《怪胎之爱》则把这一交叉推向更极端的形态。宾诺夫斯基家的畸形儿被有计划地生育出来，以充当家族生意的“展品”；其中女性畸形身体更被附加了生育与繁殖的功能，成为被彻底工具化的景观。邓恩以此揭示在奇观市场上，残障女性的身体不仅是“被看的物”，还是“被生产与被消费的物”。有鉴于此，残障研究若缺少性别维度的介入，便难以看清凝视机制的完整运作；反之，性别研究若忽略残障视角，也会遗漏“残缺的身体”如何构成性别压迫的另一种语法。

（四）无声之眼：反凝视与主客反转

凝视机制最关键的潜能，在于它的可逆性。加兰-汤姆森强调，凝视并非只有压迫的一面，它同样具有“生成性”。当被凝视者“回望（”stare back），观看关系可能被重新配置，在承认

---

[12] MELVILLE H. Moby-Dick; or, the whale[M].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3: 第 99 章“The Doubloon”.

[13] GARLAND-THOMSON R. Staring: how we look[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4] （法国）米歇尔·福柯. 临床医学的诞生[M]. 刘北成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15] GARLAND-THOMSON R. Staring: how we look[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 汤拥华. 福柯还是拉康：一个有关凝视的考察[J]. 文艺研究, 2020(12):5-19.

现实损伤的基础上将其置于一个强调伦理关怀、社会支持的文化框架内进行呈现，将“凝视”从一种单向度的权力施压转化为一种双向的、具有建设潜能的伦理互动机制。[17]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论及“他人的目光”如何使自我客体化；辛格的存在则展示了另一种情形，当一个人拒绝（或无法）应答时，他被凝视得最为彻底，也最不被理解。[18]然而辛格并非全然被动。他的眼睛始终在看，沉默的、不在场的注视，构成对这四个投射者无声的返照。当辛格的挚友安东纳波洛斯（Antonapoulos）被送入精神病院并死去后，辛格选择了自杀。这一结局的意味在于辛格从未被他的“听众们”真正看到，投射关系恰恰遮蔽了投射者自身。麦卡勒斯由此揭示了一个悖论，即以他人为屏幕的观看，最终使人无法看见任何人，包括自己。这正是“感知共同体”的失败形态。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反凝视的可实现形态。当辛格以沉默的注视回望，当奥林以第一人称讲述怪胎家族，当赫尔加在被剥夺后终于看清曼利的“空”，一种“看穿他者目光之虚妄”的能力便已萌芽。主客反转不意味着被观看者去夺回“看”的霸权，而意味着观看关系本身从单向转为互涉（reciprocal）。

表 3-1　凝视的形态与反凝视的可能

凝视形态	观看主体与机制	代表性文本	反凝视的可能
多元凝视	船上众人对同一枚金币作出互不可通约的读解	《白鲸》“杜布隆”章	观看由主体的独白转为多声部的意义争夺
医学之眼	临床与统计学把身体转为可分类、可书写的病例	《怪胎之爱》	揭示“正常”规范的历史构建性
奇观之眼	观众付费参与被组织的观看仪式，以确认自身之“正常”	《怪胎之爱》“怪胎秀”	被观看者以第一人称讲述，松动奇观的边框
性别化凝视	男性凝视与健全主义规训合谋，形成双重客体化	《好人难寻》《怪胎之爱》	言明失败非个人过失，而是两套机制合谋
无声之眼	聋哑者被当作可任意投射的屏幕	《心是孤独的猎手》	沉默注视的返照，使观看关系转为互涉

四、“感知共同体”：生成与重构

如果说以假肢为锚，在“物”的层面改写了对残障身体的存在论理解；以目光为轴，在“关系”的层面拆解了凝视的权力结构，那么当我们不再把身体预设为完整自足的主体，当我们不再把观看理解为单向度的权力，个体之间究竟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一起，个体之间能否形成一种既非同一性认同、又非情感共同体式的联结？

（一）辛格的“耳朵们”：投射、依存与共同体的失败

《心是孤独的猎手》提供了“感知共同体”的消极样本。四位孤独者围绕辛格形成的聚合，表面上是“共同体”，实质上却是四座互不相通的孤岛，他们共享的不是经验，而是对同一个沉默者的投射。这种聚合不具备真正的相互性，没有人真正看到了他人，包括辛格。小说的书名取自菲奥娜·麦克劳德（Fiona Macleod）的诗句，其意象是“孤独的猎手”——一个在幽深的房间里倾听、等待却终究无法被人听到的人。[19]这一意象正是对辛格处境的最佳注解，作为听者，他似乎最接近共同体；但作为聋哑人，他恰恰被排除在语言共同体之外。麦卡勒斯由此把“听”与“被听”的失衡呈现为现代孤独的结构性根源，即我们渴望被听见，却往往只是在彼此身上寻找一面安静的墙。

[17] 庞文,冉光懿.从凝视到共生：电影中残疾叙事的范式嬗变及其逻辑[J].残疾人研究,2025(6):56-66.

[18] SARTRE J-P. Being and nothingness: a phenomenological essay on ontology[M]. BARNES H E, trans. New York: Washington Square Press, 1992.

[19] MCCULLERS C.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0: 卷首题词.

但麦卡勒斯的深刻之处在于，她并未否定这种聚合的意义。相反，正是通过写出它的失败，她揭示了共同体的真相——共同体并不建立在彼此相似或彼此理解之上，而建立在相互依存的事实之上。米克、杰克、比夫、科普兰医生之所以需要一个聋哑人，正因为他们各自都携带着无法被主流世界容纳的残缺，即青春期的性别焦虑、工人的阶级创伤、种族隔离的屈辱、失聪者的语言剥夺。他们的“聚合”是一种“瘸腿者相互倚靠”的结构，只不过他们误认了倚靠的方向。这一失败案例对本文至关重要，它使“感知共同体”免于被浪漫化为一种“弱者联盟”的温情想象。正如凯弗在《女性主义、酷儿、瘸子》中所批评的，任何把残障简化为身份认同的做法，都会遗漏身体经验中不可通约的部分。[20]辛格的“耳朵们”提醒我们，真正的共同体必须承认成员之间的不可通约，而非抹平差异。

（二）触觉的语法：凯勒的感知重构与语言共同体

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自传《我的生活故事》（The Story of My Life）提供了“感知共同体”的积极样本。凯勒在 19 个月大时失去视力与听力，长期处于几乎与世界隔绝的状态，直到安妮·沙利文（Anne Sullivan）到来，以在她手心里拼写字母的方式，向她传入“语言”。转折点是著名的“水”的瞬间：当清凉的水流过凯勒的手，沙利文在她另一只手上反复拼写“w-a-t-e-r”，凯勒忽然领悟到“这个流过我手指的清凉的东西，有一个名字”。[21]这一瞬间的意义远超“识字”，它意味着一种感知方式的中介化，触觉被改造为接收语言与知识的通道，身体由此获得进入符号世界的方式。凯勒的“义肢”不是一件实物，而是一套以“触—听”替代视觉的感知装置，她的自我正是在这套装置中被建构起来的。[22]

从这一案例可以看出，共同体的形成以感知的可传递性为前提。凯勒与沙利文之间构成的关系，正是本文所定义的“感知共同体”的原型，其纽带不是身份（两人在生理与社会处境上截然不同），而是共享的、被中介化的感知经验。伊德（Don Ihde）所论的“技术具身”在此得到印证——技艺性的感知方式使身体向世界敞开。[23]凯勒以触觉建立的“语法”，表明残缺从不是感知的终点，而是感知重新分配的起点。需要强调的是，凯勒的案例并不应被读作一个“战胜残疾”的励志故事。恰恰相反，它的意义在于揭示：所谓“正常”的感知配置本身只是一种偶然的历史安排，触觉、听觉与视觉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等级。凯勒之所以能够进入语言与知识的世界，靠的不是把自己改造为“看得见的人”，而是与沙利文共同发明了一套新的感知语法。这一“共同发明”的过程，正是共同体最原初的形态，语言并非先在的私有物，而是在两个人之间被反复协商、逐渐稳固的相互理解机制。

（三）从“残缺”到“照护”：残障正义的共同体模型

若将三个案例并置，可以提炼出“感知共同体”的三条构成原则。

第一，部分性优先于完整性。亚哈的假腿、赫尔加的木腿、达娜的断臂共同表明，任何身体都是部分的。传统共同体理论（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以共同身份为纽带，预设了“完整的成员”这一虚假设定；[24]而残障身体的经验揭示，依存（dependence）而非自足，才是人类的真实状态。伊娃·基泰（Eva Feder Kittay）关于“依存工作”（dependency work）的论述指出，照护关系不应被理解为单向的施与受，而应被视为一种相互构成的伦理关系。[25, 26]

第二，异质性优先于同一性。辛格的“耳朵们”的失败在于，他们假定了同一性（把辛格当作自我的延伸），而未能承认异质。正如南希（Jean-Luc Nancy）所言，真正的共同体不是成员

[20] KAFER A. Feminist, queer, crip[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21] KELLER H. The story of my life[M].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1903.

[22] IHDE D. Bodies in technolog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23] IHDE D. Bodies in technology[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24]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1983.

[25] 赖锦祥. 纳斯鲍姆能力进路中的残障问题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4.

[26] KITTAY E F. Love's labor: essays on women, equality, and dependency[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共享同一本质的“融合体”，而是诸独异者（singular beings）之间的共在。[27]感知共同体的成员之所以能相连，恰因他们各自携带着无法被同一化的感知方式。

第三，照护优先于治愈。医学承诺“治愈”，其前提恰恰是否定残缺的合法性。而残障正义所主张的“相互依存的政治”，则把目标从“消除差异”转向“支撑差异”。[28]皮普兹纳-萨马拉辛哈（Leah Lakshmi Piepzna-Samarasinha）在《照护工作》中把残障正义实践描述为一种日常性的、相互的照护网络，它不以消除障碍为目标，而以创造让人得以共同生活的支持结构为目标。这正是“感知共同体”的伦理内核，即它不追求把残缺修复为完整，而追求让不同的残缺得以相互支撑。[29]

五、结语

本文以“假肢—目光—感知共同体”为框架，对美国文学中一条 19 世纪至 20 世纪的残障身体谱系作了考察，进一步研究残缺如何从“被标记的事实”转化为“可共同承担的经验。本研究亦希望为比较文学的实践提供一个可延伸的接口，将“假肢”“凝视”“感知共同体”三者作为跨语际的“概念工具”，用于考察不同语种文学对“残缺”的不同想象方式，进而追问是否存在一种可跨文化沟通的“残障诗学”？这一问题的答案，或许正藏在各民族文学对身体之“部分性”的处理差异之中。同时提出最终不是关于“缺失”的哀悼，而是关于“部分性”的伦理构想。残缺不是有待修复的缺陷，而是重塑共同体想象的结构性起点。在这一意义上，“假肢的目光”从来不只是被看的对象，它同样在观看着我们的世界，并追问我们究竟准备好以何种方式，彼此支撑。这既是一个文学问题，也是一个伦理问题，更是一个我们每日都在以行动回答、却往往不愿直面其责任的现实问题。如果说残缺书写能为未来留下什么遗产，那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视角的转换。从追问“他们缺了什么”，转向追问“我们凭什么自认为完整”；从凝视他者的身体，转向审视自身同样脆弱、同样依附、同样需要被支撑的存在。让它在注视我们的同时，也照见我们尚未学会的那件事——如何以彼此的部分性，支撑起一个愿意承认所有残缺的共同体。

"Deficiency" as Method: Disabled Bodies, Gaze Mechanisms and the Sensory Community in American Literature

WANG Jingy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Shaanxi, China)

Abstract: Taking prosthesis as the core pivotal concept, this study selects Moby-Dick,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The Heart Is a Lonely Hunter* and *Kindred* as primary texts, with *Geek Love* and *The Story of My Life* as comparative texts. It systematically delineates the representational mechanisms of disabled bodies in American literary contexts spanning the 19th to the 20th century, and advances the core research question of how deficiency structures the dynamics of seeing and being seen, and subsequently engenders community. This problematic differentiates the present study from existing scholarship that

[27] NANCY J-L.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M]. CONNOR P, et al, tra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28] PIEPZNA-SAMARASINHA L L. Care work: dreaming disability justice[M]. Vancouver: Arsenal Pulp Press, 2018.

[29] 薛皓洁.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残疾书写[D].扬州:扬州大学,2018.

predominantly offers representational inductions of disability images.The argument unfolds along three interconnected threads: prosthesis, gaze, and the sensory community. It explicates how prosthesis, operating as a dual apparatus of materiality and narrative, furnishes a relational model distinct from national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politics for the sensory community anchored in shared, partial, and interdependent perceptual experiences. This paper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disabled body writing in American literature does not constitute a mourning for "lack", but rather an ethical formulation of partiality: namely, deficiency is not a defect awaiting remediation, but a structural point of departure for reconfiguring the imaginative framework of community.

Keywords: Disability Studies; Prosthesis; Gaze; Sensory Community; American Literature